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4.012

论经济规则在“一带一路”区域建设中的 规范引领作用

周雄文¹, 周 凌²

(1. 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工业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制定经济规则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以这一原则规划引领“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建设发展是时代所需, 民心所向, 国家所盼。针对区域发展期待经济规则更加健全完善及发挥更大规范引领作用, 必须以科学严谨立规引领“一带一路”建设, 以健全经济执规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以公正司规展示“一带一路”建设, 以良好执规环境保障“一带一路”建设, 以培育制度文化确保“一带一路”建设。

关键词: 经济规则; “一带一路”; 区域建设

中图分类号: D922.2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4-0095-08

引用格式: 周雄文, 周 凌. 论经济规则在“一带一路”区域建设中的规范引领作用[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4): 95-102.

On the Normalizing and Leading Role of Economic Ru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ZHOU Xiongwen¹, ZHOU Ling²

(1. College of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2. College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Formulating economic rules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of achieving shared growth through discussion and collaboration. It is the need of the times to plan and guid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with this principle, and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it. In view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economic rules will be more sound and perfect an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normalizing and guiding. We must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ith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regulation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ith sound economic regulations, sho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with fair judicial rules, ensur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with a goo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foster the system culture to ensure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Keywords: economic regulations;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al 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 2019-06-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区域法治保障机制研究”(BCGA009)

作者简介: 周雄文(1950—), 男, 湖南娄底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法律教育、经济法学与行政法学;
周 凌(1982—), 男, 湖南娄底人, 湖南工业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为风力发电故障诊断。

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中国经济面临新的时代背景。其中仅就经济规则而言,随着以WTO为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逐渐式微,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治理格局。我国对外贸易谈判起步较晚,在规则方面长期扮演接受者、适应者角色,尚未建立起与自身经济贸易规模相匹配的规则话语权地位。因此,

“我们将加快制定配套法规,确保严格实施《外商投资法》。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1]在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下,运用经济规则来规范和引领区域国家的互联互通,携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互赢、共同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本文以“一带一路”区域建设为视角,就如何以完善的经济规则与政策来规范引领区域经济建设作一些探讨。

一 “一带一路”区域建设需要经济规则的规范和引领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即明确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努力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合作目标,具体规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时确定的五大走向、六大经济走廊、多国多港的“5+6+N”总体布局,为中国主导、多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宏伟建设的发展框架。这项倡议是众多国家间的宏大协同创业工程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工程,具有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

(一) “一带一路”倡议是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要求

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国际贸易形势非常严峻复杂,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日趋严重,WTO规则和国际准则受到严重践踏,多边贸易体制举步维艰,区域合作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一些区域经济体在经济政策和规则履行上“逆全球化”倾向愈发严重,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实施显性或隐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和举措。“一

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扛起的全球化、持续化发展的大旗,旨在通过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各国各地区人民和全人类带来福祉。这不仅符合新时代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持续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持续化发展增加新兴推动力量,也为“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培育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持续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增长引擎。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要求在推动主体、主要内容、合作模式、目标导向方面建立新的动力机制、制度框架和具体规则。在推动主体方面,除了充分发挥传统发达区域国家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外,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会更加重视全球市场布局,重点提升发展中、欠发达区域及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水平,更加重视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以充分发挥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在合作内容方面,在传统的贸易与投资全球化基础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将更加注重货物贸易的便利化,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和规则的公平公正化,投资的自由化,产业合作的深度化与互惠互利性以及基础设施的支撑性、共享性和促进性。在合作模式方面,在传统WTO规则框架下,区域和国家及企业集团将更加倾向于由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来形成相应的投资与贸易便利化的规则和承诺,即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将以双边或多边为主,实现充分尊重缔约方选择发展方向、阶段与各自基本情况的合作目标。在合作目标导向方面,在不断扩大全球贸易规模,促进本国、本区域发展的基础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将致力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已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增添了新的推动力量。六年来,中国完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68个国家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近80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75个,累计投资超过900亿美元,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6.5万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30万个。诸多“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基础设施合作项目有序推进,例如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印尼雅万铁路、土耳其东西高铁、匈塞铁路、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二期、卡拉奇高速公路、瓜达尔港口、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马来西亚皇

京港以及中哈、中俄、中缅油气管线等。

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进程中,我国充分重视与区域东道国、国际组织的合作共识,积极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自贸协定、投资协定等代表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截至2019年5月,我国已与“一带一路”区域14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33个合作文件,各方达成283项务实成果;区域国家签署17个自贸协定、56个双边投资协定、54个双边税收协定、67个文化交流合作协定、27个双边标准化协议;与1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629对友好城市和省洲关系。^{[2]7-9}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推进,诸多类型的合作平台搭建起来了,其中包括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产能合作基金等创新融资平台及边境经济合作区等经贸合作平台,其为深化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合作、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加大完善服务“一带一路”金融支持保障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 “一带一路”区域建设需要经济规则的规范和引领

经济规则是“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实现双边、多边协定、协议和合作的基石。在新一轮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在经贸规则亟需重构的阶段,我国参与、主导规则制定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更是体现“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权利、维护和扩大各自国家经济利益的必要举措。目前,我国正重点围绕区域内多边、双边协定协议,科学、公正构建涵盖“一带一路”区域国家、辐射五大洲重要区域国家的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是我国开展经贸谈判的重点区域,也是我国构建“中国版”经贸规则的优先选择。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和原则得到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赞同。各国普遍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互联互通的地球村,人、财、物、信息等都在全球加速流通,彼此紧密相联。各个国家地区要实现自身的良好发展,共商共建共享是必然选择。然而,当前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存在着许多不符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思维方式和体制机制。比如,有的国家强调自身利益至上,采用以对抗为主的单边主义和经济保护主

义,这同解决区域和全球问题需要各方合作的现实产生矛盾;他们轻易否决或退出来之不易的国际合作协议,或者强行将未经协商的方案、议案在多边国际组织中进行表决,人为制造摩擦,破坏规则;在经济、安全治理领域,随意增加关税,打击别国企业,以国家政府力量实施霸道和欺凌,搞小多边封闭政治集团、排他性贸易集团、针对他方的军事结盟体系等,其行使的是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强权逻辑,其行为是构建新型区域和国际关系的严重障碍,这些国家是地地道道的麻烦制造者。严峻复杂的现实说明,我国积极主导“一带一路”经济规则制定,是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愿望和期待。因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核心价值和关键字是“共”。“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物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3]这是习近平反复强调的观点。尽管“一带一路”区域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现行法律法规存在诸多不同,但在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一带一路”倡议是区域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只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才能凝聚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共商共建共享的经济治理观是中国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面临的挑战提出的解决思路 and 规则方案。只有共识,才能共建共享。近十年来,我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稳定在30%以上,在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化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不断提升,各国对我国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就为改进和完善中国版的经济规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构建经济规则重要性的认识,尽快实现我国由规则的“追求者”到“参与者”再到“引领者”的转变,形成“海陆并举”“东西互济”“区域联动发展”的新格局,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由“外向型”向“全面开向型”发展,丰富“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中国方案至关重要。这就要求:(1)经济规则要注重科学性。科学立规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克服立规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从实际出发,科学公正规范公民、法人、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体等组织的权利、义务,顺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借鉴各国成功经验,

认真把握立规工作自身的规律,加强对规则条款词语运用、规则体例与内容安排等技术问题的研究,在注重规则“立、改、废、编、配”的基础上实现规则体系的内部和谐。(2)经济规则要注重规范性。政府、行业协会、法人代表、项目负责人等是规则的主要执行者,是依法行政、执规、管理、治理、服务的“关键少数”。制定健全严谨的公共权力权益规范,明确行使治理程序细则,能使权利权益的授予有据、行使有规、运行有序、监督有力、实施有责、问责到位,确保代表人民和国家赋予的权利权益真正用来为人民和国家谋福利、求发展。(3)经济规则要注重公正性。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全球化。经济规则必须以保护权益、维护契约、信守承诺、平等协商、公平公正、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健全完善经济法规制度。制定以公平公正为核心原则的经济规则,真正实现有规可依、有规可循、执规公正、依规理事。在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的建设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依法依规对这两种失灵现象加以规范和调控,需要发挥经济法治的调控、规范、引领和保障作用。^[4]

二 经济规则引领“一带一路”区域建设的现状

六年来,我国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们共商共建合作协议、协定、文件都已顺利实施。首届高峰论坛达成的5类、76大项、279项具体成果已全部落实到位。第二届高峰论坛确定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了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以更有力地推进对外开放。

(一)以中国方案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建设成效巨大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中国方案,在引领“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如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组织、覆盖亚洲16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及亚太自贸区谈判(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等国际经济机构与机制中,我国积极主导和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通过“增量改革”获得具有区域和全球影响的规则制定权,实现有差别、渐进式的开放与自由化,不断增强

我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和世界经济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性和公信力。

“一带一路”倡议符合我国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及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发展要求,有助于我国探索更高层次的改革举措,实现规则的提质转型。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包容性”“互惠性”“共享性”成为其最突出的特征。我国的“朋友圈”更加广泛,初期规划的五大走向、六大经济走廊、60多个重点合作参与国家已大大超出预期,已有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表示积极响应支持。由于坚持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注重与现有双边和区域各国合作机制相辅相成,在完善贸易促进、支持对外投资、鼓励来华投资、搭建经贸新平台等方面合作成果丰硕。沿线区域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的潜力和空间因包容性、互惠性、共享性得以充分释放和体现,有针对性、步骤性地开展“五通”建设的成效日趋明显。“一带一路”注重多样化,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坚持灵活并富有弹性的协商沟通平台,具体合作项目注重双边和多边利益,强调各方共同认可,条件成熟一个启动实施一个。在各方共同努力下,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各项合作项目都已顺利实施和落实,有力促进了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共享互赢成果日益增多。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确立的通过构建包容、公平、互信的规则体系及打造平衡、普惠、共享的发展模式,赋予沿线区域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话语权,将有利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5]

(二)引领“一带一路”区域的经济规则亟待完善

从全球视角看待我国经济规则的重构和引领的巨大作用,仍有不少差距。以对外投资发展为例,我国的审批监管制度有待完善,财税金融支持有待加强,服务保障体系有待健全,风险防控能力有待强化。我国是国际经济规则体系的后来者,国际经济规则对我国经济的约束程度与我国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从经济体量来看,我国是为全球第二经济体,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GDP的比重为

1.32%, 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 1.93%、2.47%、2.91%, 世界对外投资流量占 GDP 的比重为 2.49%, 均高于中国。早在 2012 年, 我国贸易总额已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虽然我国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但称不上是贸易强国; 因为贸易强国必须是一个经贸规则参与制定的主要国家, 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是一个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优势明显的国家。

首先, 要强化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理念。理念是行为的先导。当前, 有人认为“先学习运用后参与制定”, 将“学习运用”与“参考制定”隔离开来, 说到底还是理念不强, 信心欠缺, 畏惧困难, 回避现实, 缺乏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勇气和信心, 思想和理念还停留在国内视角, 看到的只是国内面临的一些问题, 而不是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和全球的角度, 来认识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重要性及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紧迫性, 也没有充分认识到“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方案”的期盼和期待。

其次, 要有积极制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长期战略规划。“一带一路”沿线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区域的国家和地区, 大多数都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方面具有强烈的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 至 2022 年, 亚洲各经济体内部基础设施投资需要 12 万亿美元, 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 6000 亿美元, 融资缺口巨大。我国有外汇储备、设备和技术优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的主要任务都是为基础设施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是我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重要抓手。这就需要按“中国方案”制定一个中长期的建设发展战略规划, 以推动“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持续发展。

再次, 要注重宣传“中国方案”在区域国家和全球的话语权重。“中国方案”的国家形象在国外市场还需宣传拓展, 国外区域国家许多市场对“中国方案”还不够知晓, 需要加大推介推广。在以往的对外工作中, 我们更多的是适应国际市场的规则要求和标准方案, 较少推介与推广自身的规则 and 标准方案。在国际市场的标准、规则、

方案方面, 多为被动的“接受者”“使用者”, 主动积极“参与制定”“主导制定”的机会不是很多。我国缺少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所需要的专业人才来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参与国际组织工作和管理, 在这方面我们较发达国家仍然在一定差距, 必须尽快加强相关人才建设, 才能肩负起相应责任。

另外, 少数国家的一些政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误判误解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担心, 采取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等手段来掣肘中国规则、方案和标准的国际化工作, 给我国规则的参与和主导工作造成了不少障碍, 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三 充分发挥经济规则在“一带一路”区域中的规范引领作用

“一带一路”区域建设发展的关键是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坚持开放、绿色、廉洁、高效理念, 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性、可持续目标, 推动共建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的经济规则和政策。这就需要经济规则从制度层面为“一带一路”区域建设发展提供有力的规范引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 强调规则至上、公正公平和依规办事。这就要求经济规则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国家的普遍价值标准和规范引领协调共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渠道, 要求科学立规、严格执规、公正司规、自觉守规、违规问责。经济规则的科学性、公正性、规范性、导向性是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建设发展的有力规范与引领。

(一) 以科学严谨立规引领“一带一路”建设

科学立规, 就是要求尊重和把握立规规律, 从实际出发, 尊重各国法律法规, 科学公正地规范公民、法人、经济体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明晰各自的权利和责任。科学、严谨立规, 是实行“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多次强调, 凡属重大的改革都要于法有据, 在整个改革发展过程中, 都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 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重大的改革举措, 只有得到法律授权, 按照法律程序进行, 具备充分的法律依据, 改革政策的推动执行才能更稳妥、更有效。这一指导思

想同样适应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因为“法令行则国治”。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沿着高效发展方向不断前进,各国政府和人民对规则、条例、条约、协议等履行和尊重的自觉意愿不断提升,倒逼我们必须科学立规、严谨立规、高效立规。比如,有关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的规则,如何使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有关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的规则,需要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有关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的规则,需要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清除各种非关税壁垒,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高质量产品;有关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规则、规划,应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等等。^{[2]79-81} 这些都需要通过开门问计、纳谏、咨询、论证、试行、借鉴、比较等程序,使各项规则科学、严谨、公正、规范、管用。

(二)以严格经济执规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立规的目的只有通过严格执规才能实现。强化严格经济执规是推进“一带一路”区域建设发展的关键环节。一要建立协调机制。随着建设加速,建立规范、合理、有效协调的国家互联互通、配合有力的整体经济执规机制,以整合、协调国际执规资源。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相关区域国家的相关部门和经济体及社会组织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外交、环保、工商、公安、安监、外贸、经济等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建立案件移送和联合执规制度,推进执规手段、方法、技术和机制创新,切实提高执规水平和效能。二要强化监督机制。监督是经济执规的屏障,应在“一带一路”区域国家之间健全经济执规监督机构,制定国际监督条例,细化国际监督内容,规范国际监督程序。在有的放矢地解决执规活动中存在的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执规问题的同时,抓住那些对“五通”有重要影响、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重大执规问题,开展执规监督检查,克服并纠正执规中的单边保护主义,保证严格执规的落实。三要健全保障机制。保障是经济执规的条件,除保障人、财、物等客观条件外,要健全制度性

举措,如坚持纠纷案件协调制度,解决重大疑难、多次退补纠纷案件久拖不决和处理打击不力的问题;打击权规交易、钱规交易行为,坚持违规违法办案责任追究制,解决执行程序法规和实体法规中的违规违法问题;坚持监督检查评判制度,解决有规不行、有禁不止、严格执规与不严格执规一个样的问题。在健全制度建设中,不仅要提出要求尽责到位,而且要解决到位不尽责的问题,为严格执规提供制度保障。四要加强队伍建设机制。强化经济执规队伍建设,坚持严格执规与加强队伍建设有机结合,既通过队伍建设来保障严格执规,又通过狠抓严格执规来促进队伍建设。在执规实践中,紧紧围绕坚持严格执规、提高执规水平这个中心环节,积极推进执规工作规范,激发执规队伍活力,提高执规队伍素质,为坚持严格经济执规提供坚实的组织保证。

(三)以公正司规形象展示“一带一路”建设

公平正义是制定和完善规则的灵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司规是维护区域国家和社会公平正义重要的一道屏障。目前,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现行的司规体制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区域国家建设的要求,司规人员理念和能力有待进一步创新增强,司规质量、效率和公正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司规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以真正实现习近平所要求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此,一要坚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兼顾。实体公正就是要按照经过依法依规审查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使裁判结果或有关决定符合公正的价值要求。程序公正是指司规机关在办理各类案件时,严格遵守程序法的相关规定,保障案件及时正确处理。强调兼顾两者价值平衡,既不能违背或破坏程序而只求结果,也不能只讲过程而不重结果。二要坚持司规工作与司规效率兼顾。公正和效率,都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力和利益问题,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司规资源和整体效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以最低的司规成本实现司规公正。司规公正必须坚持司规为民、以人为本,坚守职业良知,强化职业德行,增强守法守规定力,建立和完善司规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重点解决影响司规公正和制约司规能力的深层次问题,

以公正司规、服务为民的公信力体现执规履责的核心价值追求。三要坚持司规价值与司规文明兼顾。英国思想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举动祸害尤烈,因为后者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却破坏了水源。”^[6]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司规价值观,必须通过公正司规和严格执规提高司规公信力而得以逐步形成。法治区域、法治社会、法治政府的建立不但要以良好法律法规存在为前提,更要以良法良规的公正实施来保证,形成浓厚的敬规、尊规、守规的法治文化氛围。敬规、尊规、守规的自觉形成就在于司规机关通过严格的司规活动,彰显司规公正;在于司规人员通过廉洁、正派、高效的作为,展示司规文明。司规机关要坚持严格公正、文明司规,必须着眼于信守司规核心价值追求,努力造就一支政治站位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规公正的司规干部队伍,着力探索解决执规难的有效途径,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合规权益,认真对待公众诉求,及时化解纠纷矛盾,以良好形象展示严格执规作为,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司规的公平与正义。

(四) 以良好执规环境保障“一带一路”建设

由于我国与“一带一路”区域国家间的经贸、投资等商事交往日益密切,相关国际商事纠纷随之增加,快速、有效地化解这些纠纷,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执规环境保障尤为重要。为此,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第二国际商事法庭相继在广东深圳、陕西西安挂牌。同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宣布成立并聘任首位32名专家委员,为搭建“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奠定了基础。针对国际商事法庭的受案范围比较宽泛的现状,在现行民事诉讼法框架内作出了新的规定,明确通过协议管辖、移送管辖、提级管辖等制度,既使得国际商事法庭具备了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国际商事案件的条件,又保持了现行涉外民商事案件管辖制度的规定性,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执规法治环境。良好的营商执规环境,需要不断优化执规法治保障服务体系。实现国际执规、区域执规与国内执规的相互联动,就是“一带一路”执规服务保障体系形成的基础,也是个体、组织和营商环境所需。世界上五大法律体系均涵盖在“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所涉及的法律体系之中,

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多边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面对如此纷繁复杂且体系庞大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群,任何一个法律服务机构都无法做到穷尽所有,服其所能。这就需要创新现行的法律法规服务保障体系,促进分工合作和专业化建设,以全面掌握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基础,切实加大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涉外法律知识储备量,以国际法为链接纽带,以增强法律服务保障体系的救济能力为重点,不断强化法律服务保障体系的规范性能力建设,着力营造良好的执规环境。一要创设法律法规共享联席会议机制和国别法律法规能力提升机制。要在优化国内法治法规制度的同时,通过创设共商的法律法规服务机制、共建的制度供给机制以及共享的法治法规互惠机制,尽力疏通国际法律法规制度供给渠道,努力实现执规法治服务保障互通。二要实行经济利益、社会公平和市场自由三者之间的价值互动与平衡机制。要公正合理分配法律法规资源,以区域或全球法治公信力、认可力为基点,打造国际纠纷解决程序性机制的中国版,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规范性的法治保障机制,努力实现执规法治保障互惠。三要营造环境、主体、人才素质提升机制。要在重视项目建设的同时重点提升人的主体能力,创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法治人才培养模式与提升素质动力机制,营造良好执规环境和内外联动协作保障体系,在国别、区域、全球三个层面,创建良好的执规法治服务协作新格局,以制度规则、人才素质和良好执规环境实现从西方大国的“殖民法”到当下的“和平法”,再到基于社会正义与自由效率互动的“发展法”的“百年之未有的革命性飞跃”^[7],借“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劲东风实现中国执规法治服务的全面升级,实现执规法治保障服务的共享。

(五) 以培育制度文化确保“一带一路”建设

文化是区域民族的血脉,制度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涵。习近平在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8]区域国家人民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传承、法治素质和法治实践正是制度文化的具体体现,是培育“一带一路”区域制度文化的重要基础。我们要以习近平关于制度文明的一系列论述为根本遵循,深入

开展普法普规教育和实践,突出教育与实践重点,坚持教育与实践指导,拓展教育与实践途径,创新教育与实践方式,切实增强教育与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尽管近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和制度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目前制度文化建设现状、社会公众特别是公务人员的制度意识、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而言,其还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发展要求。尽管各级政府和各级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比较系统广泛的法律普及教育与实践工作,但制度文化的培育与效果并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公众权利意识强,规则意识弱;公务员权利意识强,责任意识弱;上级政府法治意识强,下级政府法治意识弱。”^[9]对此,要进一步抓好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上级与下级的均衡普法普规教育与实践。一要强化法治理念教育。法治理念是制度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是法治实践的核心内涵。法治社会的建设要以民众的法治理念为中心目标,将法治法规内化为民众自愿自觉的行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持把法治建设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法治理念的过程。坚持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法规权威,强化法律法规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且自觉将其全面落实到立法立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监督等各个环节,落实到依法执政、依法履职、依法治理、依法办事的各个层面,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环境建设。二要着力完善制度建设。制度文化的核心价值形式是规范。立规矩、讲规则、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法律法规是治国之重器,良法良规是善治之前提。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有的领导之所以能以权压多、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权大于法,其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某些法律法规制度还不完善,缺乏应有的规范效力。法治法规体系还不够健全,尚未将公权力紧紧地关进法律法规的制度笼子里,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保障权力、以法律法规规范权力、以民主监督权力的良法善治格局。只有从制度上铲除滋生权大于法的人治土壤,形

成尊法、守法、靠法、护法的社会氛围,才能增强人人对法律法规的敬畏感和信赖感,彰显法治法规的权威和尊严。三要坚持德法并治有机结合。制度文化的培育途径是德法并用,这是我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常用治理方式。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两者并用,相得益彰,才能达到最佳效果。道德是法律法规的价值内涵,法律法规是道德的制度底线。良好的道德风尚,文明的习俗传承,可以净化社会环境,增强社会正能量,减少矛盾纠纷,降低法律法规实施阻力,提高法律法规权威。通过依法依规打击犯罪,充分保障人权,厘清责任,明辨是非,平衡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充分发挥法治法规的效力,引导社会民众切实增强法治意识、道德意识,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做到知荣辱、明善恶、重品行,守规矩,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以制度文化确保“一带一路”建设。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19-04-27(02).
- [2] 刘祥.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7-9.
- [3] 习近平.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同舟共济[N]. 人民日报, 2015-03-23(01).
- [4] 张守文. 经济法总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7.
- [5] 苏长和.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N]. 人民日报, 2019-03-27(10).
- [6] 本书编辑组. 法治中国的顶层设计[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4: 168.
- [7] 张晨. 论“一带一路”纠纷如何一站式解决[N]. 法制日报, 2019-04-25(06).
- [8] 习近平.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 人民日报, 2019-05-15(02).
- [9] 周雄文, 周凌. 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法治保障[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7(1): 83.

责任编辑: 徐海燕